

城乡链接导向的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启示 ——以浙江黄岩为例

Implications of Urban-Rural Linkage-oriented “Socio-Spatial” Regeneration Practices in Rur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Huangyan, Zhejiang Province

杨贵庆 王丽瑶 黄璜
YANG Guiqing, WANG Liyao, HUANG Huang

摘要：加强城乡链接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行动之一。该行动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推动要素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实践相呼应。其中，认识并把握城乡社会系统与空间系统的关联逻辑对于实现空间规划目标尤为关键。“社会—空间”发展的互促与耦合具有三个典型过程特征：若空间发展超前于社会演进，将引导社会结构变化；若社会系统演变过快则将引发空间失序与资源配置失衡；若空间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化相适应，则二者将协同发展、互促互馈。本文立足加强城乡链接与城乡融合国际国内双语境，以“社会—空间”关联耦合理论视角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近12年36项规划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其针对乡村地区“社会—空间”演变特征的规划方法和实施路径，旨在强调促进“社会—空间”关联耦合对于加强城乡链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性，及其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土化实践贡献中国经验。

Abstract: Strengthening urban-rural linkage is one of the crucial actions for achieving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This approach aligns with China's practice of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mphasizing “the two-way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and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Among these efforts, 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upling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ystems and spatial systems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for achieving effective spatial planning aims.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coupling of “socio-spatial” development exhibit three typical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if spatial development outpaces social evolution, it will guide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if there are major shift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it may lead to spatial disorder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mbalance; if spatial development aligns with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they will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dual context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erspectives on strengthening urban-rural linkag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dopts a theoretical lens of socio-spatial coupling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36 planning practices over the past 12 years in Huangyan District, Tai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It summarizes planning method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targeting the socio-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areas, aiming to emphasize the urgency of socio-spatial coupling in strengthening urban-rural linkage and achiev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urthermore,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ng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and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tributing China's experience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关键词：城乡链接；社会—空间；城乡融合；乡村实践；浙江省黄岩区

Keywords: urban-rural linkage; socio-spati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practice; Huangyan District in Zhejiang Provinc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乡村聚落空间分异机制及规划调控研究——以浙江地区为例”(5237806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多层网络的城乡交接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织特征及机制研究——以江浙沪‘城乡融合’试验区为例”(5220807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作者：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同济大学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yguiqing@163.com
王丽瑶，博士，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wangly20@163.com
黄璜（通信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重点实验室，副教授；hhuang@tongji.edu.cn

0 引言

自2015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来,其在地化与实施路径始终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探索的两个核心议题。作为实现SDGs的重要策略工具,加强城乡链接(urban-rural linkage)的实践概念由联合国人居署于2019年正式提出,并通过《城乡链接指导原则——促进地区综合发展的框架行动》(URL-GP: Urban-Rural Linkages: Guiding Principles. Framework for Action to Advance Integrate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形成了指导全球实践行动的框架,以推动缩小区域、城乡差距的目标。与此同时,我国深入展开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发展转变的制度和实践探索,通过创新土地政策、培育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多元路径,多维度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此过程中,城乡发展的相关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得以丰富和发展。总体来看,联合国人居署在全球推动的加强城乡链接行动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具有一定相似性,即推动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向协同发展转型。这样的发展转型蕴示着国内外在城乡发展理论层面深刻的认知转变与实践层面的积极探索。

从国际层面看,加强城乡链接议题已从概念演绎和研究范畴逐步转化为具有明确指导价值的政策工具与实践框架。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与差异性,URL-GP创新性地提出地方参与、综合治理等10项指导原则,以及涵盖综合规划、治理立法等11个核心要点的行动框架。为了落实行动框架,不断获得全球实践反馈,2020—2023年期间联合国人居署陆续发布了三版《城乡链接典型实践纲要——落实指导原则与框架行动以推进区域融合发展》(Compendium of Inspiring Practices on Urban-Rural Linkages: Implementation of Guiding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of Action to Advance Integrate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从治理层级、公共政策工具、多元主体等方面进行全球实践指导和典型案例的遴选与推广。已发布的43个案例覆盖全球五大洲,反映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和背景下多尺度调控、多主体共治等方法的实践经验和反思。笔者在梳理研究已收录的典型实践后发现,“地方参与”和“环境敏感性”等方面的原则在实践中作用突出;“治理赋权”和“综合规划”等维度是应用聚焦的重点;典型实践的探索大多突破单一行政区边界限制,体现出跨市域、区域协同特点,反映出全球城乡治理范式从刚性管控向弹性协调转型的明显趋势^[1]。

从国内层面看,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的深刻转型,这一演进过程既反映了国家治理理念的革新,也体现了城乡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我国城乡关系进入系统性调整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确立“城乡融合发展”理念,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完成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到“统筹协调”再到“有机融合”的三阶跃升。在学理层面,国内研究重点关注制度要素^[2-3]、空间重构^[4]、要素流动机制^[5-6]等方面的知识建构。研究内容涵盖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空间等多元维度。这种理论演进并非线性迭代,而是呈现“政策驱动—实践反馈—理论演进”的互促特征。特别是在长三角、成渝等国家战略区域的城乡融合实证研究中可见,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协同发展多元路径逐渐形成。

综上,在国际语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内语境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需求中,加强城乡链接、全面促进城乡融合是指导规划建设以及相关领域探索的重点。其中,厘清城乡“社会—空间”相互作用和内在逻辑关系是关键之一。城乡“社会—空间”关联耦合将对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良好组织以及治理层面的有效反馈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本文围绕城乡发展中“社会—空间”良性互动导向下城乡链接的实践路径和乡村空间重构的政策启示展开研究,以期开拓此领域的理论探索并对构建更可持续的城乡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研究的关键问题聚焦以下三方面。(1)城乡发展中的“社会—空间”互动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系统与空间系统如何相互影响?(2)城乡链接的实践路径与挑战:基于“社会—空间”互动机制,空间实践如何加强城乡链接并促进城乡要素流动?(3)乡村空间重构的政策启示:空间实践对城乡规划与公共政策制定有何反馈?

1 城镇化进程持续深化语境下城乡“社会—空间”演进的理论逻辑

1.1 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发展

空间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跨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学界对空间本质探讨,从自然科学视角下的几何学认知,到精神、哲学、文化维度的拓展,再到社会空间理论的兴起。目前,尽管学界尚未发展形成普遍认可的“空间科学”的理论体系^[7],但当代研究已逐渐突破传统物质空间的局限,向空间与社会相互作用逻辑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空间问题已不再囿于物质层面的干预,它受到物质空间与社会发展逻辑关系的重要影响。对“社会—空间”关联机制的理解成为当引导代城乡发展的关键维度之一。

1970年代,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了“社会完全城镇化”的假设^[8],将对城镇化的理解从空间维度的建设拓展

到“社会—空间”联系与社会认知等维度。在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既是“自然的”事实也是“文化的”事实。其研究强调生产方式与组织生产了空间与时间，同时也生产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具体、既定的对应关系。他进一步提出空间承载生产、运输、能源流动及其产品分配等活动，这个过程也参与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联发展。因此，空间不是孤立或静止的，它支撑着生产生活、社会经济等日常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对空间的理解需要依赖对“社会—空间”整体辩证研究，因此实证研究的整体性不可或缺^[7]。

21 世纪初以来，随着全球化与城镇化进程持续深化以及科技高速发展，人们对于资源利用的能力进一步加强，推动了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空间利用的转变。同时，宏观尺度上地域空间格局重组现象显著，这一过程强化并加速了“区域—地方”尺度间的“社会—空间”联动效应。在此背景下，星球城镇化理论^[9]主张以整体性视角重新审视空间组织逻辑的变化及其相关联过程的转变，强调城镇化推动的“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使地域关联更加紧密。博任纳等（Brunner et al.）^[10]提出当代空间利用呈现双重逻辑：一是在地性（localized）维度，空间与生产组织、日常生活实践深度耦合，具体表现为农业模式转型、能源利用革新以

及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演进；二是跨地域（trans-local）维度，在实体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航路）与虚拟网络的双重支撑下，空间日益突破地域边界，其演变机制直接受区域乃至全球活动的结构化影响。

与此同时，社会学领域对于空间的理论认知也在社会结构和组织逻辑的不断演化中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空间”本质的理解，格奥尔格·齐美尔、玛蒂娜·勒夫^[11]等提出“空间社会学”（Raumsoziologie）的概念，拒绝“空间”的静止性和主观性，并强调从空间关联性、商品性与活动联系等方面对空间秩序进行剖析和理解。“社会—空间”关系也逐渐受到社会空间理论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强调了“社会—空间”的演进、社会系统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它产生的空间分异也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关键性影响^[7,12]。

1.2 “社会—空间”演进的逻辑关系分析

如上文提到的，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社会与空间的演进并不存在既定的、具体的对应关系，但“社会—空间”的关联关系是显著的。因此，空间供给逻辑与社会需求变化不协同时，往往会导致失衡匹配（图 1）。这种失配现象具有显著的多尺度特征：如微观层面可表现为规划建设空间的低效利用与利益相关者自发的空间（无序）改造行为并存，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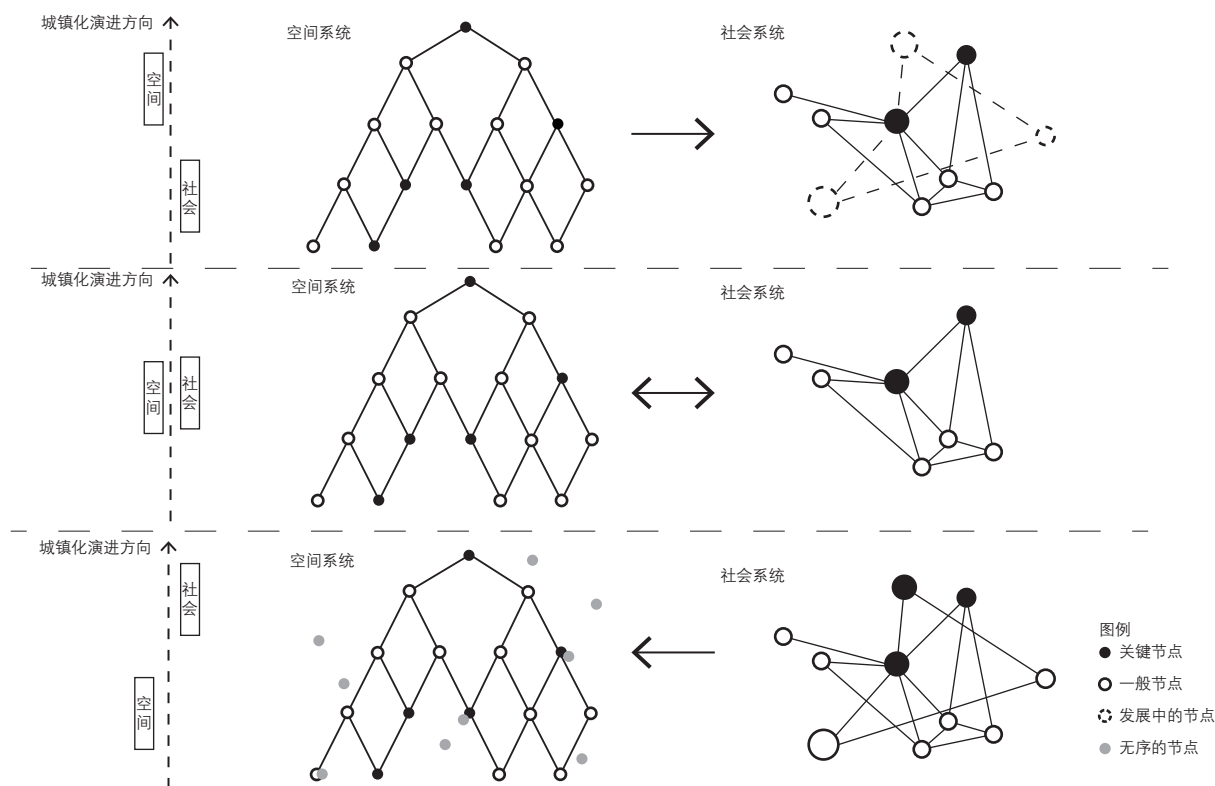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空间”耦合作用的理论逻辑关系示意图

了非正式实践对空间功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宏观层面则可能呈现为不同社区间极化发展的空间利用模式，这种分化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关系）在空间维度上的投射。正如空间错位理论（Spatial Mismatch Theory）基于美国当时实证研究提出社会空间相互作用机制，指出居住隔离与就业机会的关系^[13]。刘志林等^[14]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的内涵，将社会网络差异、制度性障碍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纳入分析，深化了对“社会—空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与空间的作用不是单向的，其互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社会—空间”协同发展。以美国郊区化进程为例，独栋住宅作为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空间标志，不仅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更直接推动了低密度住区模式的普遍化，这种物质空间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强化构成了郊区化的核心动力机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198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通过重构空间组织的方式回应了社会问题。它对传统邻里开发模式进行的反思不仅推动了公交导向开发（TOD）模式的实践与形成，修复了郊区空间碎片化问题，更蕴含着明确的社会目标，即通过混合居住策略促进社会融合并以公共空间序列设计促进社区认同的重塑。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空间利用逻辑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空间既是社会系统的产物，也是塑造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

1.3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社会—空间”演进特征与趋势

城镇化进程持续深化推动了“社会—空间”演进。如今，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是“社会—空间”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有效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重要议题。结合国际语境，联合国人居署将加强城乡链接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城乡融合发展和加强城乡链接的关键目标之一都是缩小城乡差距，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城乡关系。这对把握乡村“社会—空间”演进的趋势和引导相关实践提出了明确要求。

快速城镇化时期，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乡村空间建设滞后，一方面加剧了乡村社会空心化^[15-16]；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空间策略引导乡村地区的精明收缩^[17-18]，导致大量空间粗放利用。较发达地区的乡村还经历了乡村工业化过程，由于空间管控引导不足，导致乡村空间无序利用和环境严重污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不可持续。

城乡融合发展导向下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乡村带来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发展契机，乡村“社会—空间”演进路径呈现多元化、特色化的特征，其重构过程也呈现显著的跨地域特征。随着道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在地方政府或市场主导下，乡村公共空间、未利用空

间得以更新和利用，为乡村地区带来更多的投资、人才等发展要素。不少实践在基于地方“社会—空间”认知的基础上，强化了地方空间与文化特征、吸引新村民的到来，但也面临差异化的可持续发展挑战^[19]。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空间”演进现象并不一定依赖于产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不同于早期国内外出现乡村“社会—空间”发展，邻近地域依托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共同点形成资源网络带动沿线乡村发展^[20]。近年来以农业经济发展为主的乡村在交通、物流、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支持下，其“社会—空间”的协同发展体现在全国范围，如浙江省黄岩区茅畲乡以西甜瓜种植产业总部为依托，组织覆盖全国多个省市的西甜瓜种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跨地域的乡村“社会—空间”协同演进^[21]。此外，研究发现，当代乡村发展过程中，整体空间类型差异不显著的乡村空间，随着乡村社会经济产业发展，与地方和区域（全球）的关联程度差异带来了社会发展的结构差异和邻里尺度空间利用的差异^[22]。

综上，在城镇化进程持续深化语境下，我国乡村地区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并呈现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乡村经济活力显著增强，形成多元产业并存的格局；二是社会结构从单一农业人口向原乡人、归乡人（返乡创业者）和新农人等多元主体转变；三是生产组织方式呈现多样化创新模式。在此背景下，乡村空间发展已突破传统物质环境改善的单一维度，亟须构建能够响应产业升级、社会重构和文化复兴等复合需求的弹性空间框架。因此，强化城乡链接的核心在于建立“社会—空间”动态适配机制。具体而言，需要通过乡村空间更新引导乡村社会正向变迁，同时激发空间活力，形成社会需求与空间供给匹配的良性互动。这种实践需避免传统城镇化中常见的“空间滞后效应”，以促进空间转型与社会演进保持协同，并推动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融合发展目标。

2 加强城乡链接导向下的黄岩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

2.1 加强城乡链接导向的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研究框架

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政策、理论和实践三者协同演进、呈现螺旋式发展的动态适配过程，具体体现在乡村“社会—空间”互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系统性更新过程中。由于各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城乡空间建设基础和资源禀赋不同，乡村“社会—空间”发展往往并不完全匹配（图1），因此乡村更新实践需通过多种形式的空间干预策略直接或间接促进地方的“社会—空间”耦合发展，以加强城乡链接。乡村“社会—空间”实践不仅作用于乡村自身社会、空间的单方面演进，如地区社会网络重构、

社会生产再分工、人居环境改善、传统空间活化利用等方面，还通过引导“社会—空间”互促，实现更加平等、积极和有效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因而，深入研究城乡要素流动显著的先行地区的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方法、路径和策略，可为其他地区乡村发展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样本，对丰富城乡“社会—空间”理论和地方公共政策的精准供给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本研究选取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为典型案例，对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这三种驱动力作用下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路径、空间干预策略及其对城乡要素流动的影响展开研究（图2）。

浙江省在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成效位于全国前列。近年来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进一步加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动力、社会意愿、文化底蕴和空间规划支撑。黄岩区是浙江省人均经济水平、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最为接近的区域之一。2024年末，黄岩区人均GDP水平与全国的平均水平一致（9.5万元），其城镇化率也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67%）。黄岩区历史悠久，生态资源丰富，民营经济发达，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基础条件较好，在2025年入选国家级“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具有较强的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基础和城乡融合发展潜力。同时其乡村“社会—空间”发展也面临差异化“失配”，为乡村更新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多样性的样本，其研究发现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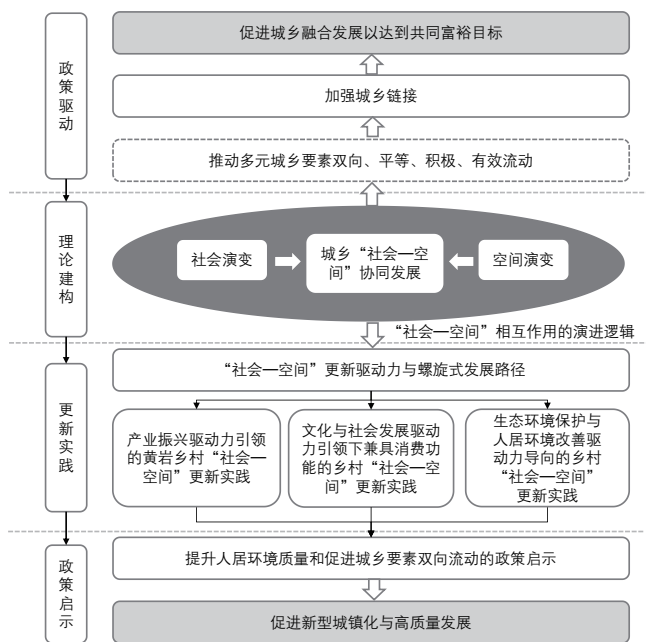


图2 加强城乡链接导向的黄岩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研究框架图

2.2 黄岩区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的案例分类

基于上述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框架，本研究以3种典型驱动力划分，将规划团队在黄岩区自2013年以来完成的36项乡村“社会—空间”更新案例分为产业振兴驱动力引领的更新实践（I类）；文化与社会发展驱动力引领下兼具消费功能的更新实践（II类）；生态环境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驱动力导向的更新实践（III类）3类（表1）。

2.3 黄岩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典型案例分析

2.3.1 产业振兴驱动力引领的黄岩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典型案例

针对具有产业基础的乡村，更新实践案例通过产业振兴驱动乡村“社会—空间”发展动态适配，以适宜的空间干预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快速城镇化时期，城市工业化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和较好的空间环境品质吸引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传统、本地化、特色产业不断衰落，生产资源闲置，乡村原有社会结构瓦解、空间环境衰败。更新实践案例基于根植性强的原有乡村产业基础，为组织新的产业活动、延伸其产业链而规划设计复合功能的新空间，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人口、资本、信息和技术等要素在乡村流动和集聚，进而重塑乡村社会结构，并通过空间的有机更新来达到“社会—空间”适配。此类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的螺旋式发展机制与不同类型的产业驱动力相关。下文结合黄岩区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自上而下式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南城街道“贡橘园”（I2）

“贡橘园”的“社会—空间”更新由黄岩区委、区政府主导，基于“千年永宁、中华橘园”的黄岩蜜橘产业发源地，以“空间建设引领—社会结构重构—空间品质升级”为发展路径。其所在的蔡家洋村空间更新策略主要包括建设功能复合的产业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设计基于特色产业文化的空间标识、整治人居环境与营造公共空间景观。“贡橘园”的空间建设吸引黄岩区多元人群、社会资本与信息等城乡要素回流蔡家洋村，促进所在区域社会结构重构及其空间品质升级。2018—2023年，蔡家洋村举办蜜橘采摘节等大型文娱活动5次，累计人流量达105万人，村民年收入增加5100元/人。

（2）自下而上式乡村产业振兴引领：茅畚乡下街村（I6）

下街村的“社会—空间”更新实践基于其根植本地社会网络中的西甜瓜种植业，以“社会结构重构—空间建设引领—社会结构升级”为发展路径。随着交通、物流、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发展，在自组织的力量下，茅畚乡西甜瓜产业

表 1 加强城乡链接的黄岩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案例分类一览表

类型	编号	案例名称	年份	备注
I	I-1	浙江黄岩区北洋农业特色小镇概念规划	2016	
	I-2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贡橘园”创意规划设计	2017	典型案例
	I-3	浙江省黄岩区“贡橘园”北入口修建性详细规划	2019	
	I-4	浙江省黄岩区宁溪镇半山村美丽乡村规划	2019	
	I-5	台州市黄岩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浙江省黄岩区乡村文旅发展规划和实施指引项目	2019	
	I-6	浙江省黄岩区茅畲乡下街村省级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规划	2021	典型案例
	I-7	浙江省黄岩区屿头乡两岸村（石狮坦区块）和美乡村建设方案及建设项目方案咨询（2024—2026）	2024	
II	II-1	黄岩区屿头乡美丽乡村——乡域总体规划	2013	
	II-2	黄岩区屿头乡美丽乡村——集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2013	
	II-3	黄岩区屿头乡美丽乡村——太尉殿及周边地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2013	
	II-4	浙江黄岩宁溪镇乌岩头村村庄规划设计	2015	典型案例
	II-5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规划	2016	典型案例
	II-6	浙江黄岩宁溪镇直街村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利用规划设计	2016	
	II-7	浙江台州市黄岩五洞桥传统社区有机更新规划研究与设计	2017	
	II-8	黄岩区屿头乡柔川景区宋韵文化园规划设计	2017	
	II-9	浙江省黄岩区高桥街道瓦瓷窑村美丽乡村规划	2018	
	II-10	浙江省黄岩区头陀镇头陀村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规划	2018	
	II-11	浙江省黄岩区乌岩头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	2019	
	II-12	浙江省黄岩区北洋镇北洋路街区更新概念规划实施项目	2021	
	II-13	浙江省黄岩区院桥镇上桥自然村和美乡村建设方案	2023	
	II-14	浙江省黄岩区上郑乡仙石村庙下和美乡村建设方案	2024	
	II-15	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2024	
III	III-1	黄岩区头陀镇白湖塘村建筑风貌整治与提升规划设计	2013	
	III-2	黄岩区头陀镇白湖塘村居民点修建性详细规划	2013	
	III-3	黄岩区屿头乡美丽乡村——石狮坦村居民点修建性详细规划	2013	
	III-4	黄岩区屿头乡美丽乡村——上凤村、布袋坑村居民点修建性详细规划	2013	
	III-5	黄岩区长潭湖地区村庄建设风貌设计技术导则	2015	
	III-6	黄岩区长潭湖地区村庄建设风貌控制管理办法研究	2015	
	III-7	黄岩区宁溪——屿头美丽乡村连接线总体布局规划	2016	典型案例
	III-8	黄岩区屿头乡环境综合整治规划设计	2017	典型案例
	III-9	浙江省黄岩区北洋镇潮济村水系规划	2017	
	III-10	浙江省黄岩区宁溪镇五部村美丽乡村规划	2017	
	III-11	浙江省黄岩区宁溪镇蒋家岸村美丽乡村规划	2017	
	III-12	浙江省黄岩区南城街道蔡家洋村美丽乡村规划	2018	
	III-13	黄岩区“十四五”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2021	
	III-14	黄岩区土屿山文化公园	2022	

形成村民域外种植与本地化农业服务总部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引领本地社会结构重构。为应对这种社会发展下的新空间需求，下街村空间更新实践主要包括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和风貌建筑的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镇村联动视角下协调村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村庄文化赋能产业空间更新等，以空间更新促进地区资本、人口和信息流动。2022年，

下街村成功被列入“浙江省第十批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获得地方政府建设资金1500万元，村庄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由此可见，两个典型案例的空间更新策略具有以产业活动组织为核心、中微观层级空间干预结合、注重空间品质适宜性和更新过程渐进式的特点。

2.3.2 文化与社会发展驱动力引领下兼具消费功能的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

针对兼具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乡村，更新实践通过促进文化与社会发展培育兼具消费功能的乡村，引领其“社会—空间”发展动态适配。这类乡村的空间布局结构总体上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随着原有社会结构因快速城镇化进程而瓦解，村庄自身又缺乏根植性强、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活动支撑，加之城市就业机会、人居品质和生活方式对乡村年轻人具有吸引力，导致乡村人口外流、空间凋敝、环境破败、基础设施不足。为了加强城乡链接以促进乡村活化，该类更新实践着重挖掘本地化、特色化要素，利用闲置设施和场地因地制宜创造新的时尚消费空间，并夯实乡村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以此吸引城市要素跨区县流动，形成新的乡村社会结构，以促进动态更新达到新“社会—空间”平衡，实现“空间建设引领—社会结构重构—空间品质升级”的多重螺旋式发展，即“社会—空间”协调发展的多轮动态适配过程。下文结合黄岩区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 文化复兴引领：宁溪镇乌岩头村（II-4）

乌岩头村的“社会—空间”更新实践基于其老村保留的110间晚清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和较完整的传统村落街巷格局，其空间更新策略主要包括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乡村公共空间，保护、修缮传统建筑并活化利用为具有消费功能的空间，保护传统街巷空间格局并提升整体环境品质，提升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初期空间更新方法是加强本地文化品牌建构，促进乌岩头文旅产业兴起和发展，随后渐进式的空间更新策略是促进基于城乡人口流动的社会结构重塑，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下乡和新乡人驻乡。2018年，乌岩头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集体收入由2014年的5万元增长到2022年的2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8年间增长了3.6倍。2022年游客接待量达到10万人次。村庄更新改造吸引归乡人、新乡人10余名。

(2) 社会发展引领：屿头乡沙滩村（II-5）

沙滩村的“社会—空间”更新实践是基于其社会发展需求。因该村紧邻屿头乡集镇驻地，在快速城镇化时期村庄建设水平需适应乡的整体发展。该村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人居环境品质改善空间较大。自2013年以来，沙滩村历经3轮“社会—空间”动态适配更新实践。先是在2013年，村庄“点穴启动”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即太尉殿社戏广场及其周边环境的更新改造，其空间策略主要为恢复文化类公共活动并提升公共空间环境品质；其次是在2016年之后，沙滩村启动整村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并活化利用闲置设施，由

区级、乡镇级政府和国企投资文旅产业，陆续吸引特色餐饮、书店和咖啡等服务性产业发展，促进城市要素入村、社会资本入乡、村民返乡创业，形成新乡人、归乡人和原乡人多元共构、动态发展的社会结构；再者是2024年以来，为了适应新阶段社会发展需求，沙滩村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空间更新策略提出在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融合新消费场景，以地方文旅经济作为支柱产业，促进村庄与乡驻地中心以及周边其他村庄联动发展。如今，沙滩村已形成乡村振兴学院为主导、专业团队管理、村集体参股运营的发展模式，每年带动农特产品年销售1500多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在2013—2022年间增长了4倍，吸引外来人员和本村回乡创业人员达40人。2022年沙滩村接待游客量超110万人次。

由此可见，文化与社会发展驱动力引领下兼具消费功能的乡村空间更新策略具有多元化、动态性、渐进式和聚焦中微观空间尺度的特点。

2.3.3 生态环境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驱动力导向的乡村“社会—空间”更新实践

针对具有生态环境资源的乡村，更新实践在生态资源保护的基础上改善人居环境质量，引领其“社会—空间”发展动态适配。在生态保护规定的限制下，部分具有生态资源的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少且产业类型选择受限，加之这类村庄大多距乡镇驻地较远，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公共服务不完善，导致乡村劳动力流失、房屋破败、人居环境品质较低。为促进城乡链接以及响应乡镇整体环境品质提升的需求，更新实践案例从区域视角出发合理规划配置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培育第三产业，形成“空间品质提升—社会结构重构”的发展路径。下文结合黄岩区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 生态环境保护导向：黄岩区宁溪——屿头美丽乡村连接线总体布局规划（III-7）

宁溪镇至屿头乡“连线”的5个村庄因毗邻饮用水源保护地长潭水库且处于丘陵地带，建设用地较少、道路可达性差、产业发展受限、建筑质量和安全防灾能力较差，原乡村人口外流严重。为了提升人居空间品质，更新实践从乡镇区域整体性出发为5个村庄设计各自功能定位，挖掘其特色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采用徒步游览线连接各村庄，形成适宜健身徒步和观景游览等多功能的“演太线”（连接宁溪镇乌岩头村“演教寺”和屿头乡沙滩村“太尉殿”），带动相关村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升级。空间品质升级和文旅产业发展共同促进人口返乡、入乡，在沿线村庄形成城乡要素的流动趋势。

(2) 人居环境改善导向：屿头乡环境综合整治规划设计(III-8)

改善人居环境的空间更新需求普遍存在于各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前期阶段。对于房屋年久失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品质较差、公共空间凋敝、公共环境杂乱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屿头乡通过多种公众参与形式形成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清单，引导村庄人居环境整体更新建设，以高品质的空间吸引区域城乡要素流动。

由此可见，生态环境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驱动力导向的乡村空间更新策略具有“区域—村庄”系统性联动、聚焦文旅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和渐进式更新的特点。

3 促进城乡“社会—空间”协同的规划实践与公共政策启示

城乡融合发展实践难以遵循单一模式的复制推广，需要基于地方生产、生活和生态特征，展开适应性实践。实践发现，强化城乡链接、实现城乡融合的有效方式和选取路径，必须准确把握并积极回应特定地域的“社会—空间”互动逻辑，促进城乡“社会—空间”匹配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有效的空间干预，引导社会发展。作为先发地区，黄岩区所开展的乡村实践，其共性在于实现空间建设与社会演进的双向调适，推动城乡要素的有效流动。这一过程可提炼为以下3个关键机制。

3.1 以创新乡村产业空间为主，强化城乡产业要素联动，促进城乡“社会—空间”协同发展

强化城乡联系的实践中，提升既有产业空间品质，创新特色产业空间，优化产业组织，促进要素流动是有效的规划干预策略。应避免所谓“典型村”的规划范式，依据城乡互动的阶段性特征，对传统产业基础、地方产业特色和生产组织方式等制定差异策略。从黄岩区的实践可以看到以下3类乡村的实施特点。

(1) 远郊乡村：以乡村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禀赋为产业提升的驱动力，通过优化基础设施和道路建设等提升交通可达性和服务可获取性，推动公共服务共享，并同步培育本地力量（如合作社等），通过创新空间形态建设引导社会建设（如半山村）。

(2) 重点镇乡村：创新产业空间，突出产业特色，重点壮大并延伸产业链，如满足城市人在乡村的消费需求，开展绿色有机农业、乡村文旅等。空间规划建设需预留混合用地（如田园综合体设施和乡村创客综合体等），促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如北洋镇各村）。

(3) 近郊乡村：创新产业空间，提升产业空间的多功能和共享使用，基于当地特色产业，形成以特色产业为主导的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如贡橘园蔡家洋村）。

3.2 以创新乡村文化感知空间为主，共促城乡文化传播、认知，促进城乡“社会—空间”协同发展

从时空维度提取乡村社会生活、生产的“文化基因”，强化文化感知和传播空间，形成地方文化认同（如屿头乡沙滩村）。

突出文化特色创新空间建设，将闲置特色乡村民居改造为特色民宿和时尚消费新场景，注重文化体验和互动等创新空间建设，提升村民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如宁溪镇乌岩头村）。

加强乡村空间共建。建立“地方能人—规划设计师—政府”多主体共建，通过创新空间建设，活化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激发社区参与潜力，将地方传统工匠技艺与当今新消费场景相结合（如高桥街道瓦瓷窑村）。

3.3 以提升乡村生态服务水平为主，强化生态价值转化，促进城乡“社会—空间”协同发展

注重“小微空间针灸”对生态廊道上乡村人居空间的整治提升，形成“点—线”渐进式扩展，探索生态价值的多元实现路径（如“演太线”沿线各村）。

以乡（镇）域为单元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系统性提升。通过系统性空间规划发展引导和基础设施布局，优化乡村空间的生态价值和相关的特色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社会—空间”适配发展（如屿头乡）。

综上，浙江黄岩区的乡村更新实践体现了强化城乡链接、实现城乡融合的规划方法和过程，也反映出乡村规划实践需要建立在充分、深刻认识当今城乡“社会—空间”发展的辩证关系上，才能采取更为精准的空间干预策略，从而实现“社会需求—空间供给—制度创新”三元协同。城乡规划应更注重空间的社会“编码”能力（即空间形态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作用），并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干预。这一认识和实践框架可为同类地区的城乡融合实践提供可借鉴、非复制的“在地化”解决方案。

4 结论

城乡融合发展必将通过强化城乡链接、促进要素双向流动来实现。但这一过程不能仅仅依赖物质空间改善，而需深刻理解“社会—空间”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实现城乡“社会—空间”形成协同演进。上述基于浙江黄岩这一先发地区的系列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只有与相应发展

阶段的“社会—空间”特征相匹配，才能构建有效的空间系统以响应社会系统演变。因此，当代乡村规划的关键在于从城乡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出发，优化空间要素的组织与利用，使空间策略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助力而非滞后、被动更新。

从全球语境看，本研究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可持续城市和社区”（SDG 11）和“减少不平等”（SDG 10）的在地化实践，也为我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相关的城乡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经验。未来，城乡融合的政策设计应更注重社会需求与空间供给的精准匹配，突破行政与地域边界限制，促进“社会—空间”适配的发展动力形成和适应性的治理框架构建。本研究也为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社会—空间”协同发展方案，并拓展了城乡融合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UPI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 [1] 杨贵庆, 王丽瑶, 饶宇航, 等. 城乡链接的理论认知、政策内涵与实践前沿 [J]. 国际城市规划, 2025, 40(3): 26-32.
- [2] 赵燕菁. 土地财政: 历史、逻辑与抉择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1): 1-13.
- [3] 刘守英. 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5(3): 79-93.
- [4] 杨浩, 罗震东, 张京祥. 从二元到三元: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都市区空间重构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4): 21-26.
- [5] 龙花楼, 徐雨利, 郑瑜晗, 等.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J]. 经济地理, 2023, 43(7): 12-19.
- [6] 叶裕民, 马国栋. 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系统性障碍与战略路径 [J]. 农村工作通讯, 2023(21): 26-28.
- [7]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English vers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1: 1-67.
- [8] LEFEBVRE H. The urban revolution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 [9] BRENNER N. Introduction: urban theory without an outside [M] // BRENNER N. Implosions/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Berlin: Jovis, 2013: 14-31.
- [10] BRENNER N. New urban spaces: urban theory and the scale ques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1] LÖW M. The sociology of space: materiality, social structures, and actio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12] 傅婷婷, 行鸣, 吴次芳. “社会—空间”关系视角下的国际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J]. 城市问题, 2023(5): 75-81.
- [13] KAIN J F. Housing segregation, negro employment, 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82(2): 175-197.
- [14] 刘志林, 王茂军, 柴彦威. 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进展与方法论评述 [J]. 人文地理, 2010, 25(1): 1-6.
- [15] 刘彦随, 龙花楼, 张小林, 等. 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12): 1498-1505.
- [16] 张玉, 王介勇, 刘彦随. 基于文献荟萃分析方法的空心村整治潜力与模式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1): 110-120.
- [17] 赵民, 游猎, 陈晨. 论农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导向和规划策略 [J]. 城市规划, 2015, 39(7): 9-18, 24.
- [18] 游猎. 农村人居空间的“收缩”和“精明收缩”之道——实证分析、理论解释与价值选择 [J]. 城市规划, 2018, 42(2): 61-69.
- [19] HUANG H. Learning from exploratory rural practi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China: new initiatives, networks and empowerment shifts, and sustainability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77): 63-74.
- [20] 黄璜, 杨贵庆, MISSELWITZ P, et al. “后乡村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当代德国乡村规划探索及对中国的启示 [J]. 城市规划, 2017, 41(11): 111-119.
- [21] 王丽瑶, 黄璜, 杨贵庆. 网络视角下农业总部驱动的乡村振兴规划研究: 以浙江黄岩地区为例 [J]. 小城镇建设, 2024, 42(5): 54-61.
- [22] HUANG H, SONG D, WANG L, et al. Enhanc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introducing small rural industries in Huangyan-Taizhou [J]. Land, 2024, 13: 946.

(本文编辑: 许政)